

1774年的“微信”

简平

叶卡捷琳娜还是年轻的德国公主时被带到俄国，嫁给了当时的王储彼得，由此陷入了地狱般的黑暗生活。叶卡捷琳娜机灵聪慧，知书达理，热情奔放，但也野心勃勃，于是，在伊丽莎白女皇逝世而彼得继位后，她策动政变，自己登上了皇位。夺位登基后，叶卡捷琳娜需要一位能力相当者辅佐施政，她看中了风度翩翩、气场十足的英俊军官波将金，而波将金也为她所倾倒。那时，波将金还在前线带兵作战，他们便日日夜夜鸿雁传情，在信中称对方为“孪生灵侣”，爱情和野心成就了历史上这对成功的浪漫伙伴和政治联盟，并由此改写了俄国的历史。

1774年，波将金大公听从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召唤，回到圣彼得堡，此后成为大帝最著名，也是权势最大的情人，同时也成为大帝最为重要的左右手，所有军国大政，几乎全由两人所定。直至去世，波将金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二号人物，而他对叶卡捷琳娜也始终一往情深。不过，他们也有齟齬的时候，而且波将金脾气甚大。一次，他俩吵翻了，互不理睬，后来，一方面大公出于对自身暴躁脾气的反省，一方面也是大帝对惯常的颐指气使、呼来喝去的收敛，他们坐了下来，决心结束争执。如同现在的一对吵过架后寻思和好的情人，面对面坐着却不说话，低着头用手机开始微信聊天，只是大公和大帝使用的是一张纸和一支笔。于是，这世界上就留下了这封两个人写在一纸上的奇异之信，你一句，她一句，你写这面，她写那面：

大公：让我的爱人这么说。

大帝：我同意。

大公：我希望，这将结束我们的争吵。

大帝：越快越好。

大公：别吃惊，我被我们的爱弄得心烦意乱。

大帝：别心烦。

大公：你不仅向我倾注了善行，还把我放在你的心上。我想独自占据你的心，超过其他所有人。

大帝：你正牢牢地、强有力地占据着我的心，并且仍将在我的心里。

大公：因为其他人不会爱你如此之深。

大帝：我知道，这我相信。

大公：我是你亲手创造的。

大帝：我很高兴这么做。

大公：对我好，你应该感到高兴。

大帝：这是我莫大的荣幸。

大公：当你想到我的慰藉时，你应该从崇高地位带来的高强度劳碌中岛到宽慰。

大帝：当然。

……

难道这不是今天的微信模式？难道这不是用一种最合适的方式来解决争端？难道这不是一经晒出便成了撒狗粮？写过这封书信之后，大帝秘密地嫁给了大公，并同意他们将像夫妻一样继续统治俄国，他们联起手来向乌克兰扩张，吞并克

里米亚，建立黑海舰队，创建从敖德萨到赫尔松的新城市。

这样奇特却又干预了历史的信函在《书信中的世界史》里比比皆是，这部由备受好评的《耶路撒冷三千年》的作者、英国历史学家西蒙·蒙蒂菲奥里撰写的新著，以解密书信档案的方式，给我们讲述了不一样的世界史。西蒙认为，在即时性和真实性方面，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书信，而人类有一种本能——记录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丢失的感情和记忆，并与他人分享，不少人早已离世，但留下的书信仍然鲜活，而正是因为那些存世的书信，让我们得以窥见历史的真实一幕。《书信中的世界史》收录了100多封信件，涉及爱情、友谊、战争、权力、衰败、告别等等人类的永恒课题，每一封信都蕴藏着人性、生命、道德、信念的刻度，并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书中收有司马迁写于约公元前93年的致任安的信函，也即《报任安书》，信中以沉重的笔触坦陈自己因遭腐刑所忍受的屈辱与悲痛，但也表达了自己勇敢而坚定的信念，即使身陷牢狱，也要奋力完成《史记》。无数的岁月过去了，但今天的人们如要研究中国古代史，一定都不会绕开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书中所收1862年7月至1864年11月间的几封马克思与恩格斯互致的信札，显示了这两位改变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创造者的深厚情谊。马克思在信中告诉恩格斯，他刚刚从《新闻报》拿到整整一个季度才6英镑的稿费，结果就被肉铺老板催逼着全部夺走还了欠债。恩格斯慷慨地接济他，通过协助经营家族企业来承担马克思一家的生活开销。有意思的是，恩格斯的父亲是个富有的棉花制造商，但乐于助人的恩格斯却用父亲的财富去资助立志推翻资本家的革命斗士。杜桑·卢维杜尔是法国殖民地圣多曼格的一个黑奴，揭竿而起为自由而战，成为第一个黑人共和国的总督，可是，因为报复殖民者而与家人一起被逮捕。在押往法国的军舰上，受伤的杜桑给拿破仑写了一封字句凄惨的信，为自己的家人乞求宽容。杜桑后来死在监狱里，但在一年之内，法国人被击败，他创建的海地赢得独立。

我们常常怀疑“被书写的历史”，其中充满了流言、猜测、神话、误解和书写者的臧否，可私人书信却是真实的，我们可以从中听到真话，尽管留存的信件并非总是说出真相，但无论如何都反映了某个独一无二的瞬间和一段经历——歌德称这个瞬间为“生命的即时呼吸”。1774年，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波将金大公写下的那封犹如当今微信聊天的信函，用的是纸和笔，能够一直保存至今，由此保留了一段有温度、有触感的历史细节，若是手机，若是平板，若是电脑，很可能便会在无意间就非常轻易地被一键删除了。



梳妆 石晓红 摄

如果街头没有音乐

章宪法

想让街头宁静下来，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这个城市的音乐，最能感知的首先来自开饭店的邻居。

邻居的音乐，不仅震撼街头，家里也在努力地准时制造。他们家有个十一二岁的孩子，饭后约摸在台灯下写字，十点光景，钢琴会准时敲起。大体想象一下：那是一张高尚的操作台，孩子的手指有些稚嫩，如果不奋力上下，那一准就是呵斥或打屁股的声音。音乐是一种声音，让人从小就吭哧在生活里。

我不想干预这种状态，我知道邻居是个异常勤奋的人。他的饭店就开在小区邻街的店铺，这也是他们家的音乐告诉我的。他家店门口的音箱，像他一样中年而油腻，黝黑且壮实，至少有四个角被磨得锃光瓦亮，只要不停电，音量都充足。

罗宾·摩根在《1963：变革之年》中说：那一年，年轻人用音乐、艺术、时尚改变了世界。

在没有读到这本书之前，我从未留意“1963”有什么刻意之处，不知道马丁·路德·金在这一年说出“我有一个梦想”。但我知道，这一年滚石乐队发行了他们的首支单曲，因为有一年的新年联欢，我抽到的就是这个题目。

音乐与世界究竟是什么关系？我对自己从来就没有那种哲学上的自信。或许有吧。有一天饭后出门散步，邻居店门口的两只音箱，黑漆漆地坐在冬天的风里，没有一点声息。我的理解是：万物都要打个盹儿。

但街头的寂静很快被音乐填补，生脆的乐声像挤碎了金属管道，分明还有一两处是铁皮的颤音。一些人围拢过来，看一个年轻人唱歌，他的身后是一排少女，每个人手上都举着方方正正的标牌。路灯隐约，看不清广告语。

城市原来是有年轻人的，也有音乐。比方说一只轮椅推过这里，轮子没有再转，头发被风从眼角揭开，像一股时光倒流。比方说店里传出的油烟，分明还有香味，一阵一阵地滑行过来，像杰夫·林恩从朋友的衣柜里找出一把吉他，用一根弦弹奏《在拇指下》。

一位朋友也散步到这里，如果不是音乐与灯光的提醒，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稀疏的头发音乐般颤动。他是一位职业音乐人，开着一家器乐培训班，钢琴，古筝，架子鼓，无所不能。有一次就在邻居这个店里吃饭，另一个朋友咨询他让孩子学什么器乐好。他说：孩子真的喜欢音乐，让他学唱歌。然后，筷子朝嘴里塞了一根香芹，像一只手指猛地按住架子鼓。

除了办班，朋友这些年一直在考各种证，拿各种奖，然后把各种证书的复印件摆在店堂。生活在焦急地等待认证，音乐不能证明音乐。

开饭店的邻居回店了，第一次看见他身上背着一把吉他。他身后那个十一二岁的孩子，正从一家音乐培训班回来。也许今天夜里，杰夫·林恩会以另一种方式与我相伴。

果然，邻居把吉他交给儿子，让他回家好好练习。饭店前的年轻人挡住了店门，邻居没有驱赶，也没有听他们唱些什么，或是插播一段什么广告。有人气就好，他侧身钻进自家的店堂，店门口的音箱触电般地抖了一下身子，居然传出《在拇指下》。

饭店前的人头没有增多，也没有减少。停留下来的，不一定喜欢音乐；悄然离开的，不一定厌烦音乐。人来人往，踟蹰或匆匆，只是没有时间快乐，也没有时间忧愁。

